

# “知识富豪”的社会义务

## ——序《新编语言的故事》

李宇明

上学,也叫读书,因为上学就是读书。但是我,也许可以说我这一代人,曾经经历过上学没书读的时期。

我老家地处豫南的穷乡僻壤,方圆几十里没有出过大文化人。小学和中学时代,除课本外几乎就没有课外书。初中和高中,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学校的图书室本无多少藏书,那时也贴上了封条。偶尔能从学友处借得《烈火金刚》《保定外围神八路》《红岩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之类的小说,也只能躲到宿舍里伴着灰暗的煤油灯偷偷地贪婪地阅读,常常熏得两鼻孔都是煤油灯的烟墨,但感觉却如同偷吃“禁果”。

1977年,是20世纪教育史永远都会提到的年份。那年恢复了高考,我侥幸跨入大学门,但仍是没有什么书读。上课没课本,老师讲,学生记。暑假、寒假常不回家,从图书馆借来“文革”前出版的文学史等教科书,一部一部地抄下来。后来书店开始有书卖了,像王朝闻的《美学

概论》、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，大家听到新书消息，夜里三四点爬起来，跑到书店门口排长队。拿钱买了书，嘴巴得受苦，两三天得忍着只吃馒头不吃菜，但心里却洋溢着幸福。

我现在仍然认为，饥饿能够产生幸福感。肚子饥饿，有点吃的就幸福；精神饥饿，看本小说、看场电影就幸福。

就是在这种“幸福”中，我买到了一本名为《语言漫话》的书，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。用报纸包上书皮，凑着桌沿在书脊上写上书名，翻开扉页写上某某藏书、何时何地购书等字样，然后就幸福地读起来。书中语言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，并使我对枯燥的语言学产生了兴趣，以至于后来走上语言学道路。

后来才知道，写这些故事的，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一批语言学家，发起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于根元、张朝炳、韩敬体、杨耐思等先生。他们当年在班车上聊天，希望为青年人写点东西，激发他们学趣，点旺事业薪火。坐而能谈，起而即行。1980年出铅印本《语言的故事》，之后改名《语言漫话》出版，之后复名《语言的故事》重版。现又约人写成《新编语言的故事》，以崭新面目再次面世。一部讲语言故事的普及读物，三十余年不断修订再版再写，有人珍藏而不弃，还引导多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，奥妙何在？

语言乃人类须臾不能离开之物，语言能力乃人类最为重要之能力。人人对语言熟悉而充满兴趣，言谈交际中常常迸发出语言智慧的火花。看看现今的网络语言和网民行为，就知道人们对语言兴趣有多浓厚，人们的语言智慧有多发达。而故事，是最具魅力的通俗文学，用故事讲语

言,自然是闻者喜见者乐,有读者,有销路。此可谓奥妙之一。

语言学曾被人称为玄学,也有人说是无用之学。北京女作家叶广芩,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采桑子》,之后拍成电视连续剧。小说讲述满族贵胄后裔民国以来的生活,有一人物是金家二格格,其子女有教员,有工程师,还有个当了语言研究员,都被人嘲笑说是“啃死工资的穷酸”。语言研究员作为“穷酸”的典型之一,虽是小说,也窥露出社会的态度。做语言学也许苦些、穷些,但语言学对社会确实有用。有位市教委的朋友告诉我,她在澳大利亚的女儿要生孩子,而她恰好刚退休,就去帮女儿带孩子。母女俩有个困惑,不知道让刚出世的小家伙先学好汉语呢,还是先学好英语?其实她们这是在做家庭语言规划,语言学能够帮她们解困释惑,做出合适的语言规划。语言学有用,这本用故事讲语言学的书,自然就有历史的延伸力。此可谓奥妙之二。

科学知识的社会化,就是科普。科普不是谁都能做、谁都能做得好的。要把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通俗地讲出来,实非易事。《语言的故事》是大家做科普,讲得生动,说得到位。讲得生动能吸引人,说得到位就读后有得。此可谓奥妙之三。

2010年9月,媒体热炒世界两大巨富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来中国,将与50名中国富豪共赴“慈善晚宴”,有人承诺死后“裸捐”以响应“巴比宴”,有人担心“劝捐”而惧怕“巴比宴”。一时间,有了财富应如何回馈社会,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。这使我联想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。知识分子是知识拥有者,高级知识分子是“知识富豪”,知识富豪如何用知识回馈社会,尽社会义务,也是值得思考、值得议论的。

新编语言的故事

《语言的故事》和《新编语言的故事》的作者们,用行动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我们应当向这些语言学的“知识富豪”学习。

2011年10月29日  
序于北京惧闲聊斋